

· 文学研究 ·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刘文刚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关键词: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杜甫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1)02-0031-05

On Du Fu Study by Zhao Cigong

LIU Wen-g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Zhao Cigong is the most diligent scholar in Du Fu's poem study in Song Dynasty. His studies covered a large scale and his annotation is the first-rate. His explanation, which wa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and thorough analysis of written literature and oral materials in Du Fu's poems, was appropriate, refined and grounded, especially in correcting the false in previous studies. In short, Zhao Cigong's *Du Shi Xian Hou Jie* is the masterpiece in the early study of Du Fu, and he is thu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scholars in annotation study of Du Fu.

Key words: Zhao Cigong; *Du Shi Xian Hou Jie*; Study on Du Fu

一

赵次公,字彦材,蜀人。生活在南北宋之间,孝宗隆兴时任隆州司法。

赵次公是宋代学者,有苏轼诗注的著作。其杜甫研究著作《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宋代最佳的杜甫研究著作。原书已佚,今有林继中所辑《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辑录较为完善。

二

书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有“新定”和“先后”二语,考察注解内容,有时一首诗注有相近的内容同时出现,正是先解与后解并存书中的有力证明。我们认为,赵次公的著作当在北宋时出版,明抄本有“宣和元刻”的题识就是证据。后赵次公又修订补充,在南宋时出版,名曰《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我们所以特地说明这个

问题,是想说明,赵次公对杜甫的研究非常投入、非常执着,花费了一生大量的时间与心血。

从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进行推断,赵次公所著《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当是百万字左右的煌煌巨著。(林继中《辑校》为九十万字,去掉林继中的文字约十万字,赵次公的文字约八十万字[包括杜甫原著]。显然,赵次公原著文字比所辑的要多得多,因为有些已完全亡佚了,不可能辑入。从现辑佚文考察,原著亡佚甚多,赵次公原著在百万字以上。)在杜甫学史上,百万字的巨著并不多见,在宋代更是凤毛麟角。更可贵的是,它的学术质量非常高。

赵次公处在杜甫学深入发展的初期,前辈学者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创新的研究留下广阔的空间。赵次公在继承前人研究项目的同时,又

大大地开拓了新的项目。他的著作有以下研究项目:一、按时间分期限对杜诗进行编排。如:“卷一开元间留东都所作。”“卷二 天宝以来在东都及长安所作。”二、对能系年的诗进行考证系年。三、对文本进行校勘,并作校语。四、对难字注音。五、说明一些诗的写作背景。六、全文注释。用集注的形式。前人有好的注,则辑录前人的注;没有好注,则创立新注。(一)注名物,包括人名、地名。(二)注典章制度。(三)注典故。(四)注语典。(五)注其他一切该注的地方。七、解。对需要说明的地方加以解说。八、对于长诗分段,并说明段意。九、论述一些诗的艺术。十、论述一些诗的思想内容。十一、辑录一些重要的评论和有关资料。十二、批评一些错误的研究。十三、有重要的总结性的研究成果。如《句法义例》,虽现存赵次公的文字已不可见,但赵次公本人在自己的注中多次提到。从赵次公注的文意分析,《句法义例》当是对杜诗句法的全面性的总结性的研究,是总结杜诗句法特点的成果。考察宋代的杜甫学史,我们认为赵次公的研究项目是最多的。大量宋代不少杜甫学著作已亡佚,我们这样说似乎不够稳妥。但通过对亡佚著作的分析、通过宋人对赵次公著作的评论、通过对现存杜甫著作的比较,我们认为我们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进一步说,赵次公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已具备后世杜甫研究完善项目的雏型、实际上已基本涵盖后世的杜甫研究项目,因而在杜甫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从赵次公的注解看,他学识高明,精通古代典籍与文化,对杜诗烂熟于心,能融汇贯通。注解时非常审慎细心,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有有力的材料证明,分析深入透辟,较少穿凿附会。全书呈现博雅精微的学术风格。赵次公生在南北宋之交,在他之前只有几位出色的杜甫集的注家,他们为杜甫集注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杜甫集非常难注,他们也有很多未注和留下一些错注,这就为赵次公的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时势造英雄,赵次公就成为杜甫学史上注和解品位最高而发明尤多的学者。(请注意,我们说的是注与解,不包括评论,即不包括对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在杜诗内容与艺术的研究方面,赵次公尚不能称为最杰出的。)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虽以“解”命名,而最主要的内容却是注,最用力的也是注。不过与一般注不同的是 它的注不是用通常注的格式而是用解的格式。

注人名、地名、典制,多进行考证,力求符合诗意,有助于诗的理解。《遣兴五首》其三:“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注云:“东坡先生云: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蹭至此。至忠亦蹭蹭者耶?故杜子美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因先生之言乃知此篇全为萧至忠而言也。按本传,萧至忠在朝有夙望。容止闲敏,见推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兰、桂者矣。又云,外方直,纠摘不法,而内无守,观时轻重而去就之。参太平公主逆谋。主败,至忠遁入南山。数日,捕诛之。考其生平:景龙元年九月相睿宗,景龙元年六月贬。是月复相,七月罢。明皇开元元年正月复相,七月诛。此漆之割、膏之煎、兰之摧、桂之折也。虽已诛矣,然明皇贤其为人,心爱之终不忘。后得源乾曜,亟用之。谓高力士曰:若知吾进源乾曜乎?吾以其貌似萧至忠。力士曰:彼不尝负陛下乎?帝曰: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此可推见,当杜公时,犹为人所怜也。旧注便差排作萧望之,非是。”(《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甲帙卷之四,以后均略书名)摒弃旧说,定萧京兆为萧至忠,较符合杜诗本意。注解详明。《天育骠骑歌》注:“伊昔太仆张景顺,考牧攻驹阅清峻。”云:“太仆,官名。《唐·兵制》云:其官领以太仆。今公诗所谓‘太仆张景顺’,自是开元时太仆姓张名景顺者也。旧注便差排作张万岁至景顺,误学者矣。万岁为太仆,自是贞观时人。今按,张说作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之碑序》云: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万匹。上顾谓太仆少卿兼秦州都督监牧都副使张景顺曰:吾马几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对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其颂曰:有霍公之掌政,择张氏之旧令。霍公,王毛仲也。张氏,景顺也。”(甲帙卷之五)引张说所作碑序,注杜诗‘太仆张景顺’为开元太仆少卿张景顺,而非旧注所谓贞观张万岁,非常有力,可谓定论。赵次公注地名亦切合诗意。《曲江三章章五句》题下注云:“此诗盖游曲江感事之作。按《剧谈录》:曲江本秦时陞州。陞即崎字,巨依切。唐开元中疏凿为胜景,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列,烟水明媚。都人游赏胜于中和、上巳节。今公高秋而往,草木变衰,触事感怀。一章叹出发之迟暮,二章判富贵之无心,三章喜生计之可乐也。旧注引元和中曲江关宴事,去此自五十余年,在公死三十余年之后,与此事并无相干。”注曲江引《剧谈录》,内容简明周全 与诗意的解说完全融为一体 显出非凡的学识与注释功力。赵次公善解方言与俗语,所

注都很好。《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注“断手”云：“断手字，晋魏以来之语。《齐民要术》言种小豆：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本朝《淳化法帖》中载唐高宗敕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诸作早晚得断手。凡营造了，当言断手者矣。”（丙帙卷之九）释“断手”清楚，引例证翔实。《自襄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三：“斫畚应费日，解缆不知年。”注“斫畚”云：“斫畚两字，是楚人语。楚人烧榛种田曰畚，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畚。其刀以木为柄，刃向曲，谓之畚刀。刘禹锡《畚田行》云：何处好畚田，团圆漫山腹。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又云：下种暖灰中，乘阳坼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故公于《夔府咏怀》又有‘烧畚度地偏’又有‘烧畚费火声’之句，畚音式车反。”（戊帙卷之八）所注明晰而细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知识功底。

最精彩的是杜诗语典的注。首先是语典的注堪称详尽。不仅三字以上的语典尽可能做了注，就是两字（词）或一字（词）确为用前人之语（词）亦做了注。赵次公说：“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稍近其诗，乃知非特两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繁切，必有来处，皆从万卷书中来。”（《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自序》，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由于对杜诗语典有理论上的认识，注语典的指导思想明确，所以该注的地方都注到了。《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幽意忽不惬”注云：“《世说》云：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思意甚不惬。摘而用之。”（甲帙卷之二）认为杜诗“幽意忽不惬”是摘自《世说》“初思意甚不惬”，甚是。《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风物长年悲。”注云：“‘长年悲’三字，出《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丁帙卷之七）言杜诗“长年悲”语典出自《淮南子》，甚确。《独酌》：“步履深林晚。”注“步履”云：“《宋书》：袁粲为丹阳尹，尝步履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人，便呼与酣饮。”（丙帙卷之三）注“步履”的语典，对理解杜诗“步履”有益。《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欲起时被肘。”注“肘”云：“‘肘’字，使《史记》：魏威子肘韩康子于车上。旧注非是。”又“月出遮我留。”注“遮”云：“‘月出遮我留’，使《汉祖纪》：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丙帙卷之五）虽“肘”“遮”各一字，然《史记》皆为杜诗二字出处，却不容置疑，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语言来源和文化背景，无疑非常有好处。其次是用解的形式注语典，不仅注明了语典的出处，同时还说明杜甫在运用前人语言时的变化

与创造。《促织》“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注云“暗用《晋书》：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故丝管之声不若虫声之天真也。”（乙帙卷之七）赵次公注极好，使我们注意到杜诗不仅用《晋书》之语，更重要的是用《晋书》之意，用得极有变化、极为巧妙。《旅夜抒怀》：“月涌大江流。”注云：“‘大江流’三字，亦仲宣：‘大江流日夜。’而五字一句，东方璩尝与卢照邻分韵，有云‘汹涌大江流’。公换一‘月’字，点铁成金矣。”注出了杜诗的语典，同时指出杜诗用语的创新达到新的艺术境界，这对于理解杜诗的艺术非常有益。可以说赵次公的注也超越了一般的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观整个杜甫集的语典注，赵次公所注语典是最多的、是面最广的，所注也是准确度最高的。他的语典的注不仅超越前人，也使后世的注家仅能望其项背。

对杜诗的内容进行解说，是赵次公著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解说一般是针对那些不容易完全理解的诗进行。赵次公往往采取补充有关材料和细细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使读者获得透彻的理解。《杜位宅守岁》：“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解云：“过，踰过也。公所以感慨，颇有深意。盖《记》曰：四十曰强而仕。公于天宝九载三十九载之冬，预献明年《三大礼赋》。表云：甫行四十载矣，沉埋盛时，则亦急于仕矣。故下云：飞腾暮景斜。而[撰]（末）句付之醉也。”（甲帙卷之二）用杜甫的人生经历来说明杜诗“四十明朝过”的深意，材料翔实，分析深入，解说很到位。《晦日寻崔戡李封》题下解云：“此篇初段盖叙事耳。下段因物感怀而终付之于酒以自遣也。当春有事乎田畴之际，而甲兵不休，忧国念君不能无慨乎中矣。”解说通过对诗意的归纳分析，揭示诗的主旨是忧国念君，有利于读者对全诗的理解。《夔府书怀四十韵》题下解云：“此篇谓之书怀，公辅叙其初赐官逢乱，至在夔州时仍以备乱之故。首尾所言，唯伤时忧国者耳。自昔罢河西尉，至战瓦落丹墀十四韵，先言肃宗时至代宗时皆有兵乱，是一段。自先帝严（灵）[虚]寝至答效莫支持十韵，专追言肃宗上升，付授今上代宗事，又是一段。自使者分王命至蜀使下何之八韵，言今日遣使，当在寡诛求、除盗贼之事，又是一段。自钓濂疏坟籍至凡百慎交绥八韵，言身在夔之事，又是一段。”（戊帙卷之七）解说诗的主题精炼明白。又分段解说大意，更有助于对诗的内容全面而详细把握。总的说来，赵次公对杜诗非常熟悉，其解说大多准确精彩，较少穿凿附会，无论是详细或是简明，都恰到好处。

解中对杜诗有时有评论。评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和关于艺术技巧的评论。关于思想内容的评论:《缚鸡行》:“鸡(蛊)[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山倚山阁。”评云:“一篇之妙,在乎落句。盖鸡之所以得者,(蛊)[虫]之所以失。人之所以得者,鸡之所以失。而人之得失如鸡如(蛊)[虫],又且相仍,何时而了乎?至于注目寒江倚山阁,则所思深矣。”(丁帙卷之七)对该诗所表现的世事隐含的哲理深表赞许。《壮游》题下评云:“公之生平出处,莫详于此篇,而史官为传,当时之人为墓志,后人为集序,皆不能考此以书之,甚可惜也。”(戊集卷之十一)特地表出《壮游》的杜甫生平的史料价值,极有见地。关于杜甫诗的艺术评论:《溪陂西南台》:“知归俗可忽,取适事莫并。”评云:“此等句皆外枯而中腴。盖言知所归宿则世俗可忽,取适于己,则凡事无可得而并。夫世俗之事可胜言哉,此不尽之意也。”(甲帙卷之四)所谓外枯中腴,即诗句外表平淡,而内里含义丰盈。评论非常中肯。《徐步》:“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评云:“公此数篇诗皆道景为新句,前篇云:‘仰蜂粘花蕊,行蚁上枯梨。’今云:‘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真冠绝古今矣。”(丙帙卷之三)前篇题曰《独酌》,前篇之前篇曰《落日》。《落日》:“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评云:“芳菲之圃,缘岸而为,樵爨之舟,倚滩而泊。此于义本是缘岸芳菲圃,倚滩樵爨舟,而句法藏巧。”(丙帙卷之三)三诗皆在“此数篇”之内。评论杜诗的语言极富创新性,有独到的眼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五:“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评云:“剩水残山,杜公之新语。”“上句义言风折笋垂绿,下言雨肥梅绽红。句法以倒言为老健。”(甲帙卷之二)这些评论都说到杜诗语言的创新和妙处。从这些评论看,赵次公对杜诗的语言有着非常深的研究。

赵次公对杜诗的系年也特别下功夫。最有发明的是通过对诗题涉及的人物和诗的内容的考证,确定诗的写作时间。《严中丞枉驾见过》自注(今按,杜甫自注):“严自东川除西川敕令两川都节制。”题下注云:“按《通鉴》于广德二年春癸卯载:剑南东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自注云:严自东川除西川,敕命都节制。则是未合为一道时,故称为中丞。当是宝应元年权令两川都节制时作。若广德二年,武再尹成都时,公已入幕府,不应有张翰、管宁之语。”(丙帙卷之五)通过考证严武为两川都节度的时间和杜甫诗的隐居内容,确定诗当为宝应

元年作,比较合情合理。《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题下注云:“相公者,杜鸿渐也。句云‘送子清秋暮’,则诗作于九月也。何以知其为大历元年之九月,盖鸿渐以是年二月壬午授命剑南西川节度使以平蜀。至明年夏四月,请入朝奏事,许之。既去,不复来蜀。则九月乃元年之九月甚明。”(丁帙卷之七)以杜鸿渐在蜀为官的时间来考证诗的写作时间,方法得体,结论精确,颇见功力。

《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批评前人杜甫学的错误中,建立自己的学术见解。不破不立,学术正是在不断清除已有的错误中发展的。而赵次公的杜甫学发明甚多,故清除前人的错误也特别多。清除前人的错误究竟有多少条,无法准确统计,因为原著已佚。估计不下千条。其内容可以说涉及杜甫学的各个方面,重点是纠正注的错误,其余如阐释、评论、校勘、编年,是正也颇多。这里举一些纠正注的错误的例证。《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作歌挹盛事,推毂期孤寡。”注云:“下句则公自负其诗所称美,可以推柏公而使之孤寡也。推毂之义,盖取《郑当时传》耳。当时推毂士及官属丞吏。注言荐举之人如本轮之运转也。旧注却引《冯唐传》:王者遣将,跪而推毂。又别一义,非也。”(己帙卷之三)杜诗旧注“推毂”为推车之义,虽释意本身并不错,但用来解释杜诗则不通,故是错误。赵次公引《郑当时传》,释为荐举之意,则符合杜诗原意。《小寒食日舟中作》:“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注“鹖冠”云:“鹖冠者,隐人之冠也。袁淑《真隐传》: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冯谖常师事之,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谖绝。旧注引汉虎贲武骑皆鹖冠,误矣。”(己帙卷之四)赵次公注鹖冠为隐人之冠,甚是。而旧注言鹖冠为武人之冠虽也是事实,但不符合杜诗之意,赵次公指出其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夜宿西阁晓呈二十一曹长》:“门鹊晨光起,樯乌宿处飞。”注云:“门鹊,则门之鹊也,如城鹊之类。义在‘起’字,则可见其为门前之鹊。古本《庄子》曰: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在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以晨光而起,义在‘起’字。杜田引谢玄晖诗:金波丽鵙鹊,以鵙鹊名门也,大为非是。盖鵙鹊本殿名,其所从入之门因亦得名鵙雀门也。谢玄晖之诗其言月色之所丽岂专指门邪?信使杜公用鵙鹊专为门,乃是天子宫殿事,

今夜宿夔州之西阁,岂可用天子宫殿事乎?樯而系之以乌,公屡使矣。此乌非真是屋上乌之乌也,特樯竿上刻为乌形,以占风耳。晋令车驾出入,相风在前。正是刻乌于竿上,名之曰相风。晋傅玄《相风赋》云栖神乌于竿首,俟祥风之来征是已。船之樯竿,其上刻乌,乃相风之义。谢灵运《广陵殿送北使》诗云:亭嘶背枥马,樯转向风乌。于义尤明。故公有云:樯乌相背发。危樯逐夜乌。而今云樯乌宿处飞,杜(诗)[时]可不省,乃云樯挂帆木,而乌泊其上,假使真乌泊樯上,何至背发与夜相逐,而于宿处飞乎?况公诗又有曰:燕子逐樯乌,则真燕逐樯上之乌而飞也。次公以杜时可之误,费辞如此,详见《句法义例》。(丁帙卷之七)在自己对杜诗进行正确的注释后,又用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厘清前人的错误,而对前人错误的批驳,又是对自己正确注释的进一步的阐释和支持。从赵次公对前人错误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杜诗的诗意的领悟和把握的精准超越一般的杜甫学者,他的学识和注释的精准也超越一般学者。他在深入研究杜甫的同时,对杜甫学特别是杜诗的注释也有全面的研究。

金无足赤,赵次公的著作也有缺陷。首先是注释有错误。如注“锦官城”云:“蜀人以江山明媚,错杂如绣,故多呼锦官城也。”(《春夜喜雨》,丙帙卷之一)显系错误。虽然可能是沿袭前人错误,作为蜀人,也不应该。其次是很多常用语和口语,也注出处,完全没有必要。如“白发”“雨打”“相与”一类,加注反而降低了注的品位。不过,这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

在宋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是一部影响非常大的著作。宋代凡是集注性的杜甫学著作,都集有赵次公的注。郭知达的九家注本更将其作为最主要的一家。就是在宋以后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著作卷帙浩繁而有残缺,学者研读相对较少,其影响不如宋代巨大。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代就好评如潮。刘克庄云:“杜氏《左传》,李氏《文选》,颜氏《班史》,赵氏《杜诗》,几于无可恨矣。”(《跋陈教授杜诗补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将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与宋以前几位最负盛名的注家著作相提并论,足见对其推重。刘克庄对赵次公的杜诗注著作评价虽然极高,但基本符合实际,而非溢美之

词。通观整个杜甫学发展的历史,杜诗的注家可谓多矣,而就注释(不包括对杜诗的评论)品位与质量而言,尚无出其右者。林希逸说赵次公注“用工极深”,是“误者正之,遗者称之,且原其事因,明其旨趣,与夫表出其新意”(《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三〇《学记》),完全符合实际。综合品评,赵次公是杜诗注释方面成就最大的学者。有关赵次公的批评,留下来的似乎不多,故钱谦益的贬斥就特别引人注目。他的酷评的影响甚至超过宋人的褒扬,我们不厌其烦,将对宋人的总评引在这里:“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其彼善于此者三家,赵次公以笺释文句为事,边幅单窘,少所发明,其失也短。蔡梦弼以摭摭子传为传,泛滥踏驳,昧于持择,其失也杂。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失旨要,其失也愚。”(《钱注杜诗·略例》)钱谦益这段话被当今学者广泛引用,大多作为正确的评论。而在我们看来,他对宋代注释的全盘否定,完全是出于抬高他自己注释的目的,完全不符合事实。“短”“杂”“愚”是概括不了宋人的杜诗注释的。从《例略》的行文看,他没有读过赵次公的杜甫学专著,只读过诸本所辑赵次公的注释。他以此来评论赵次公的注,近乎瞎子摸象、痴人说梦。沈曾植说:“(钱谦益)语若曾见次公书者,然检《绛云楼书目》无之,而逸诗附录且沿旧本之误,书赵次公为赵次翁,则受之固未见也。次公此注,于岁月先后,字义援据,研究积年,用思精密。其说繁而不杀,诸家节取数语,往往失其本旨,后人据以纠驳,次公受枉多矣。”(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明抄本(残卷)后记)沈曾植对钱谦益的反批评是非常有力的。我们所以用这样巨大的篇幅来批评钱谦益的谬论,目的是还赵次公一个公道,提醒学者重视《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赵次公的杜甫学著作在宋以后流传不广,其杜甫学的精华并没有被明清学者广泛知悉和吸收,并没有反映在明清的杜甫学中。我们当今的学者应该充分吸收赵次公的研究心得,使杜诗的注释和研究更深入、更精微。这对于推动杜甫学的新发展,是很有益的。

[责任编辑 梁多云]